

旧文 | 大厂寄生手记

冷罐儿 冷罐罐 2021-11-03
00:00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袤，有那么多种存在的形式在同时存在着。当一个爱斯基摩人在极地的冰屋里炙烤刚捕获的海豹时，一个亚马逊雨林的女战士正将抹着箭毒蛙汁的弓箭架在缺失的左乳上，而我，一个大厂寄生者，正在一台哀鸣着的主机风扇上烘干内裤，度过没踏出过这栋建筑物一步的第四年三个月零二十五天。

对我而言，极地、雨林，或者大漠与草原，都和大厂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一种自然。我，只是恰好被刷新在大厂里，大厂，就是我所置身的自然。

我为何会来到大厂已不再重要，因为我总会来到这里，我身处哪个大厂也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大厂都是一个厂。

我只记得，那年被大厂优化掉后，我也试图去别的地方看看。但我很快发现，我早已没有了兴趣、爱好、愿望以及任何想去的地方，即使四处漫游，我的双脚还是会自动走到大厂门口，然后围着那座雄伟的大楼一直转圈、转圈，像寻找着牧羊人的羊。

我别无选择，只好重新走进大厂——身份不是员工，不是外包，就只是陌生人——并就此住了下来。

工卡，是一切前提的前提。

正如垂死的大象会走向神秘墓地，工卡，不是已经在失物招领处、就是在去往失物招领处的路上。入厂第二天下午，我在那儿冒领了一张工卡，安稳度过了许许多多天，直到原主人离职。

不知为啥，大厂人都不愿挂失或者补办工卡。我观察了四年，结论是他们对除了工作以外的一切事物都表现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倦怠。工卡丢了之后，他们一直面容支付、线上打卡、用办公 APP 刷开一道道门禁——大厂真方便极了。

接下来的四年，我接连不断地冒领了二十七张工卡。但我永远不拿来消费，永远只刷免费的东西，这并非因为我怕被发现，而是我对大厂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尊重。

有了工卡，吃不再是一个问题。食堂早中晚免费，中秋有月饼，端午有粽子，无论是不是腊八都有粥，过年有饺子。

令我讨厌的是一成不变，每个档口都是敷衍而刻板印象的全国美食。

我试着在公司内网上抱怨食堂的乏味，经过数月连续不断的发帖，一篇名为《为什么食堂没有印度菜和越南菜》的帖子因为太过离奇而受到群嘲，终于引来行政部怜悯的目光。

一个月后，我吃到了咖喱拌饭和越南米粉，现在，每个档口都是敷衍而刻板印象的国际美食。

还有什么比休息室的太空舱更值得热爱！睡在里面，我感觉自己就是大厂孕育的生命之果。我和大厂纵情交缠，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愈来愈不可分割。

直到那个开门的行政突然被优化，我被锁在休息室不停休息、不停休息，直到新人火速交接，才告别死神。出舱后，我双手合十，对大厂的招聘效率感恩戴德——要是呆在一个国企，我早已变作一具干尸。

我转而睡在那些铺在工位上的行军床上。行军床时多时少，在夜夜寻觅的苦楚中，我发现了行军床数量与大厂股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用 matlab 反复验证了三遍。

如果行军床极速变多，我立即重仓大厂，如果行军床大减、或空床突然增加，我马上减仓。用这个朴素的方法，我已经赚了不少钱。但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买入卖出的计算公式，不过是我与这座大厂的一场密谋。

每一个工位，都被藏了一只眼睛，大厂理所当然掌握这些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长。我有时会游荡到这些眼睛的后台——一台连接着一万台密密麻麻的屏幕的庞大服务器——然后在那看一整天。

猜测同胞们能在大厂里面生存多久，是一场自言自语的游戏。大多数时候我的判断会错，毕竟我当年也没搞明白大厂生存法则。

我曾认为那位妆容精致的女销售在大厂里待不过半年。她实在是一个亚逼，桌上的《销售圣经》和《员工价值手册》之间夹着几本伊藤润二的漫画。结果一年多过去，她虽然没有晋升，但也没有被优化。

我也曾认为那个西装笔挺的男中层可以一路扶摇直上。他看起来很有气场，青年才俊，进退有度，对待下属雷厉风行，对待上司会服软。但试用期过了，他晋升失败了。下属倒是节节攀升，现在和他同级别了。他气不过，连夜提交了离职信。

这些匪夷所思的案例让我明白，大厂在我面前只露出了冰山一角，我越是拼命理解大厂，对它的认识就越来越少。

现在的我习惯于想象，大厂其实是一个由P/M等级组成的速度不等的同心圆，越往中心转速就越快，离心力也越大，中间的人稍有不慎就被甩出来，倒是那些边缘者能大大厂里住得悠长。而对我这样纯粹的寄生者来说，大厂的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毕竟我不会被同一个大厂抛弃两次。

但我绝不愿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薅羊毛者，更不可能把自己上升到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者高度。

我始终对大厂心存敬畏，我知道这一切荫蔽我不应白白得到，我应该工作，即便没有工作，也应当自我驱动。

首先要报答失物招领部门的迁就，在我连续二十七次冒领工卡后，他们仍然善意地假装不认识我。

离职员工遗弃的私人物品中，总能找到些值得招领的。四年来，我找到了三十七支羽毛球拍，十八张身份证和三张驾照，九副眼镜和数以百计的耳机。找过到的最贵重的东西，是在一条牛仔裤裤兜里翻出来的一枚未被送出的新婚戒指。

实在不行，我也要试图把自己变为大厂中的一个景观，类似于门口那盆儿盆栽。

我健身，我总结身上的肥肉到肌肉的转化路径，计算转化面积和转化率，直到自认为镜子里的自己还算形象不错。

我还练习对人微笑，不断调整嘴角上扬的弧度，收集用户反馈，小步快跑迭代，直到那些眉头紧锁、步履匆匆的员工在最短时间内舒展眉头，用同样礼貌的微笑回应我。

我的烟盒里放着粗细不同的各种烟，都是在天台抽烟的大厂人那儿讨要的。烟，在我看来，和大厂食堂里面的免费午餐一样，都是大厂缔造的共产主义产物——别人口袋里的烟，至少有一支应当属于我。

我会尽我所能与他们聊得开心，这是他们用一根烟买到的，时长为一根烟的陪聊服务。

如果给我一支兰州，我会和他们聊一聊最近的项目进展，讲讲打法、抓手与项目复盘，聊聊他们给程序员们提的需求有没有排上日期；如果给我一支爆珠的ESSE，我会和他们聊聊最近市场公关部的营销手段，聊聊老板又布置了什么脑抽的 Case；如果给我一根华子，那我只好用为领导分担的心态，和他聊聊海淀这边儿的学区房压力和孩子上才艺班儿的事儿。

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寂静的。我不过是大厂的附庸——水牛上的牛氓或者鲸鱼上的藤壶——我避免、也必不可能和任何人建立任何本质联系，就像大厂人和大厂的关系，也就那样，若即若离。

别问在哪里能找到我。“大厂”有可能是一家一边被唾弃一边趋之若鹜的互联网大厂，也有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业吸引了眼球而风评渐长的金融大厂，也有可能是一家管理不够严格的地产大厂，甚至，可能就是一家货真价实的制造业大厂。

重要的是我要住下去，我得永远住在这里。

